

上海解放 70 周年

# 上海 1949：从金融重建到经济新生

陈旭东

上海的解放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问题，也有着诸多待解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等，必须提前筹谋、有所准备。

1949年5月27日，作为近代中国经济金融中心和亚洲最大国际通商口岸的上海正式解放，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标志着国民党政权从军事、政治及至经济层面的全面溃退，也标志着上海这座城市的社会经济生活从这一天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毛泽东曾将进入上海、接收上海、管理上海称为“中国革命过一难关，它带有全党全世界性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接管上海·文献资料(上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59页]，认为这将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大城市的能力的考验。确实如此，尽管经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的先后告捷，早前工作重点在农村的中国共产党已陆续解放并接管了一些大的城市，但这些城市都不可与上海等量齐观，有限初步的城市执政经验对上海这座当时拥有600万人口的中国和亚洲最大城市是否适用也尚待检验。

在旷日持久的战争阴云笼罩和内外市场通路封锁之下，解放之初上海的经济金融已遭受沉重的打击，新生的上海市人民政府面对的是一个风雨飘摇、狂澜倒侧的局面，尽快恢复企业生产、经济建设以保障民生成为首要任务。为此，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华东局、以陈毅为市长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在经济建设及对工商业的处理上遵循了16字方针——“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基于此，在1949年这样一个特殊年份里，上海经济经历了一个从萧条困境向复苏新生的转变，而金融秩序的重建则是这部经济新生大剧的序曲，为上海随后在新中国经济金融建设中进一步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奠定了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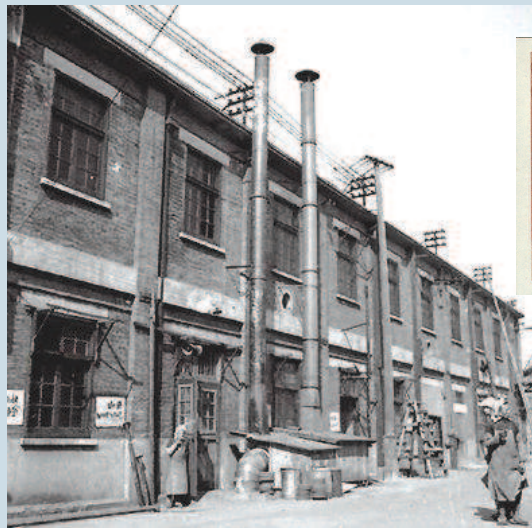
## 动荡时局下沪上紊乱的经济金融

上海是近代中国民营经济

的重要发源地，曾涌现了大批全国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如火柴大王刘鸿生、粉纱大王荣德生、棉纱大王穆藕初、化工大王吴蕴初、颜料大王周宗良等，正是这一批经历了市场淬炼极富企业家精神且对西方科学管理思想已有所接触的民营企业群体承载了近代上海的光荣与梦想。尽管受到多年战争冲击，上海的民营经济规模、比重及其当时在全国的地位依然不可小视。解放前，上海拥有民营工业企业年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比重达83%，占全国民营工业总产值也有36%之多，民营商业零售额占全市商业零售总额的比重更是达到92%，是国内民营工商业最集中、民营经济发展最发达的工业重镇和商业中心(孙锡鸿《上海“四月危机”的前前后后》，《上海党史研究》1994年第2期)。

不过，战争阴云笼罩的承压、内外市场通路的隔断，也还是使得解放前夕的上海社会经济局面日渐严峻，物资严重匮乏，物价急速上涨。1948年8月19日金圆券发行之际，上海物价已比上年底上涨近60倍。蒋经国、俞鸿钧曾坐镇上海督导金圆券币制改革，并公布《经济管制法令》和《物价管制办法》，执行为期70天的限制物价政策，然而政府限价与物资短缺交叠的结果是抢购风潮。11月1日政府限价政策取消后，物价顿如脱缰野马，以米价为例，当月中旬每石米价即从原限价20元9角，一路攀升甚至突破2000元大关。与之相应，12月国民党金圆券发行量已超83亿元，是原定最高发行限额20亿元的4倍多，出现严重货币超发。进入1949年后，解放前的上海物价涨势并未有所缓和，常常是一天数涨、天天上涨，5月中每石米价曾高达3亿元以上(姜铎《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下上海的物价与通货膨胀情况》，《上海经济研究》1989年第1期)。可见其时上海经济金融局面之复杂、艰难。

物价畸高的背后，是在多元通货并存的格局下人们对法币继而是金圆券的价值储藏和交换媒介职能，不再抱持信心，其实质更是对货币当局信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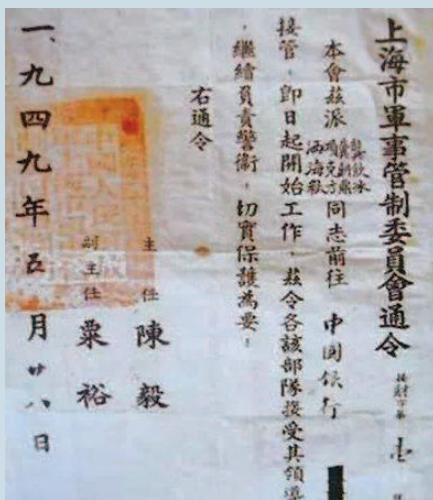
↑ 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同日，市军管会接收了原中央印制厂上海厂，改为上海印制一厂，并以最快速度，扩建成一至五个工厂，同时开工印制人民币。图为中央印制厂上海厂



↑ 上海解放不久，由上海印钞厂印制的50元纸币(上海财经大学博物馆馆藏)



↑ 军代表龚饮冰(左一)、冀朝鼎(左二)进驻中国银行，受到热烈欢迎



↑ 5月28日上海市军管会签发的中国银行接管令

↓ 上海市民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兑换金银



缺失。国民党政府从上海运走了大量黄金、白银、银元、美元等，导致了货币市场本身的内在供求关系失衡。自1948年12月起，国民党政府分若干批次从上海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将大量贵金属和硬通货，包括早前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所收没的黄金、白银等运往台湾。蒋介石曾手令汤恩伯：“上海存有约值3亿多银元的黄金、白银，命令吴国桢请假，改由陈良以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代理市长，负责利用大批轮船将全部金银抢运台湾。在未运完之前，汤恩伯应集中全部兵力，

死守上海。”(唐文《国民党统帅部关于京沪杭的作战》，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7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686页)解放军接管时，上海中央银行金库里已只剩黄金6180.595两、1546643.4银元、8768.22美元和少量其他外汇(《中央银行稽核组工作总结报告》，上海市银行档案，Q61-1-1430)。

在多种通货的较量中，金圆券极度贬值，已失去价值信誉，沦为人们不愿持有使用的“劣币”，而银元则逐渐占据

上风，成为市场上通行的事实上的本位货币。根据1949年4月29日刊登于《经济导报周刊》的报道，解放前夕的上海金融已处于冻结状态，各银行、钱庄“为紧缩业务起见，从上周六起已开始停止拆放，同时对所有客户一律停止票据抵用，由于当日交易退票太多关系，市面交易已大部停顿”；“一般市民为了保值起见，不论现钞或本票，一律不表欢迎，现在是‘老二’(袁头)的天下，所有一切交易全部以‘老二’为本位，

(下转3版) →